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華僑

朝鮮總督府報告書「朝鮮的中國人」

祖運輝 翻譯
張啟雄 主編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The Societ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R.O.C.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華僑：

朝鮮總督府報告書「朝鮮的中國人」

祖運輝 翻譯

張啟雄 主編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The Societ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R.O.C.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

編序

區域化是踏出全球化的第一步，而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醞釀與發展則是最新的時代趨勢。海外華人在東亞區域的分布、深根與發展，則是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先鋒。因此，近代海外華人在東亞的變遷與發展是東亞區域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部分。

從宏觀角度看歷史演變的話，可以發現海外華人在東亞地區近代歷史的發展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頁，同時也是海峽兩岸學者長期以來所共同關注耕耘的重要課題。惟當前海外華人學術研究的成果多為早期學者累積之研究，以今日眼光視之，與二次大戰後初期的三十年間台灣豐富的海華研究成果相較，相對顯得單薄。理由之一，就是史料的問題。

就相關史料而言，雖然國內也不乏相關華人史料的整理與出版，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的華僑檔案，就頗具份量。不過，純就華僑研究而言，該資料仍有不足之處。究其原因，除清季以後到民國三十八年之前的外交檔案分存於不同地方，史料本身亦僅止於對當時華僑活動的整理，卻無當地政府對相關華人的調查資料。

再從另一角度看朝鮮華人相關史料的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係根據總理衙門及外務部的「朝鮮檔」，整理彙編而成，起自同治三年迄於宣統三年（1864~1911）。也就是說，自1911年後的在朝鮮華人相關史料十分匱乏。史料不足，自然影響研究。有鑑於此，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特別期待能針對相關海外華人史料推出系列叢書，希望藉由史料的引介，增加國內海外華人研究的素材。

因此，本會史料叢書系列首先推出朝鮮總督府的「調查資料第七輯」，以求拋磚引玉。

此項調查資料乃日本殖民當局在統治朝鮮期間所出版的叢書系列，內容涉及當時朝鮮半島社會的各個面向。雖然有關朝鮮華僑的中日文史料為數不少，但專題性的調查報告則屬珍品。本會基於推廣海內外華僑研究，特別將新加坡大學日文系祖運輝教授的中譯本加以編輯出版，以饗國內讀者。

基本上，本書首先針對韓國各地的華僑作背景介紹，然後觸及1910~1923年的華僑人口變化，再依據各行業的戶數、社團組織、教育設施、以及華僑的各項納稅額提供相關史料，最後再針對華商的進出口貿易作說明。希望透過此史料中譯本的付梓，提供學界作為研究參考，甚至提昇學界對東亞華人的研究興趣。但願將來有機會能針對「朝鮮華僑」舉行具深層意義的國際學術會議，開拓海華研究的國際新視野。

出版之際，承鄭家慶先生費心費神，勞苦有加，藉此片隅，特表謝忱。

中華民國海外
華人研究學會

理事長

張啟雄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譯序

一、前言

本篇共有三節，目的是將本書放在它所產生的社會和歷史脈絡裡。第一節簡要評介原書的撰寫經過、組織和內容；第二節介紹原書產生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第三節勾畫日本殖民地政府華僑統治政策的概要。

二、簡要評介

本書原來屬於朝鮮總督府的「調查資料第七輯」，1924年在總督府的所在地京城（漢城）出版。所謂「調查資料」乃是日本殖民當局在統治朝鮮期間所出版的叢書系列，代表官方所支持的殖民地研究的成果。它的內容廣泛，涉及朝鮮半島的歷史、地理、風俗、宗教、制度等。¹ 本書是總督府庶務部調查課委託日人山內從1923年底到1924年初蒐集各地資料彙編成書者。翻譯用的底本是1996年東京龍溪書舍的翻印本，收在《韓國併合史研究資料》的第十八冊裡。原書除了兩頁的序以外共有十三章203頁。第一章是總論，第二章到第十三章分論各「府」情況，總論以外各章的基本格式相同。總論概觀朝鮮半島，有詳細的人口數字、職業分類統計、進出口貿易統計，還介紹主要進出口商品、華商的組織和貿易手法，旁及華僑的生活形式、工作條件和教育設施等。其他各章的基本組織如下。首先是陳述某府華僑的略史，包括1910年日本殖民統

¹ 見崔吉城（2000）的介紹。

治開始到 1923 年為止華僑人口每年的變化。其次是介紹 1923 年當時的情況，包括各行業的戶數、社團組織、教育設施、以及華僑的各項納稅額。下來是華商進出口貿易的概說，跟著是主要華僑商號的介紹。然後對各行業作分別說明，最後介紹華僑農業人口的情形。由於各府華僑勢力參差，而且經濟活動類型不同，所以各章詳簡不一。其中以京城府、仁川府和新義州府三章內容最為充實，原因是這三地華僑的人數和經濟力量遠遠超過其他各府。

日本統治朝鮮時期有關華僑的原始資料中經已出版、方便使用者在中文方面主要有《中央僑務月刊》和《外交部公報》裡的相關部分。² 日文則有總督府的各種年報和統計，如《朝鮮總督府統計年報》、《總督府統計要覽》、或者是每年出版的《朝鮮事情》，此外還有朝鮮的日本工商業團體如「商工會議所」和「工業協會」的出版品。前者多根據中國駐朝鮮單位的報告，有及時性和明確的地方性，代表中國官方和當地華僑組織的觀點。後者所提供的資料比較零碎，分散在不同項目之下，比較不好利用，而且代表日方的立場。不過無論中日文，屬於專題論著而又內容充實者恐怕只有這裡譯介的《朝鮮的中國人》一種。

本書的價值至少可以從三方面來看。第一，它是總督府統治時期極少數專門論述朝鮮華僑的日文著作之一。總督府和日本人民雖然對朝鮮華僑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有所謂的「支那人之患」或者是「支那人勞動者問題」的說法，但是在調查和研究方面（就已經出版者來說）卻不見得有顯著的成果。單純的從數量來看，戰前和戰爭期間日本華僑研究的重點很明顯是放在東南亞而不是東北亞。個中理由很簡單，東南亞的

² 參考黃寬重（2000）中有關目錄。譯者感謝張啓雄教授贈予此書。

數百萬華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重要性，是朝鮮的幾萬華僑無法比較的。³不過就是拿朝鮮和日本比較，雖然兩地華僑人口大略相當，日本華僑研究的份量卻比朝鮮華僑研究來得多（雖然還是沒有東南亞那麼多）。在研究偏少的情況下，本書是了解總督府時期朝鮮華僑史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第二，本書由於是總督府的委託調查，所以能夠比較全面的收集到地方政府和警察當局所掌握的經濟和保安資料，甚至包括各地銀行和郵局跟華僑的交易數字。這種材料對於研究華僑經濟活動的實態應該是非常有用的。第三，本書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對日本統治時期的朝鮮華僑史作了比較綿密的紀錄。在地理上它有系統的敘述朝鮮半島各府華僑的情形，在時間上它所提供的逐年統計數字清楚的反映早期日本殖民統治下華僑人口的增減和流動、貿易活動的消長以及職業類型的變化。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本書雖然重要卻也有明顯的缺點。它最大的弱點應該是時間上的局限性。因為它成書於1924年，所以內容只包括日本殖民統治（1910-1945）三十六年中最初的十四年，差一點不到整個殖民時代的一半。1920年代後期所發生的朝鮮人的激烈排華運動，以及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總督府對華僑的一系列措施都在本書範圍以外。如此，總督府統治的後半期裡朝鮮內外的局勢動盪非常，華僑受到的沖擊極大，本書的年代下限不包括這時期確是很遺憾的。它的第二個弱點是沒有交代清楚它本身是在什麼政治和社會條件下產生的，更廣義的說，就是沒有說明它自己的歷史文化脈絡。原序雖然指出「支那人問題」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引起種種議論，將來大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可是正文裡再沒有解釋在朝鮮華僑究竟引起什麼具體問題，或者是這些問題有什麼爭議性的地方。細心的讀者從書中不難找到一些線索，比如華工人

³ 見祖運輝（2000:135-138），Tsu（1996），福崎（1996）中相關目錄。

口增加引發與朝鮮勞工的競爭，華僑菜農壓倒日朝農民進而把持蔬菜供應和銷售，或者是華僑壟斷中朝進出口貿易，不讓日本人和朝鮮人分羹。可是這些都只不過是片言隻字而已。歷史脈絡既然交代不清楚，讀者就只好理解本書在整個日本統治朝鮮史裡的地位。

它的第三個弱點是調查不夠深入。原序提到本書自收集材料到編寫完成時間不過只有幾個月，雖然調查員親自到過各府收集資料，相對於調查課題所涉及的範圍和層面，用於研究的時間還是顯得倉促。大概也就是因為這個關係，書裡的資料大部分屬於比較表面性的統計數字和事實，如人口、納稅額、職業、主要商號、東主姓名等。而且就是這種資料也不見得能夠完全掌握，例如某些地方的銀行和郵局跟華僑的交易數字就無法收集到（見譯文第三章和第九章銀行交易額處的注解）。此外，同序也指出本書的調查對象是有選擇性的，它所選定的都是地方行政中心所在的府和近郊地區，但沒有包括更遠的郊外鄉鎮。歷史上華僑傾向於聚居在各地的行政中心和其近郊，這樣的調查方法也不是沒有道理，不過還是難免有不夠周詳之嫌。其實，本書也有稍為提到的現象，即華僑從行政和商業中心逐漸向地方鄉鎮的流動，應該是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社會趨勢。本書的編寫人大概也意識到這些問題，所以在原序裡清楚的宣稱本調查不過是將來一連串華僑調查的開端而已。可惜這種研究後來似乎沒有繼續下去。

三、編寫背景

本書編寫的歷史背景是日本官方和民間長期以來對朝鮮華僑勢力的關注、競爭心理、甚至公開的敵視態度和行爲。中日商人在朝鮮的緊張關係並非始於日本殖民統治，而是可以追溯到甲午戰爭後日本勢力在朝鮮的迅速擴張，甚至可以說是起源於日韓江華條約（1876）和中國朝鮮

商民水陸通商章程（1882）的簽定，因為兩者引發中日政治和經濟勢力在朝鮮的對峙和衝突。以下先借幾個例子簡單介紹從朝鮮開始對外通商到日本設立總督府期間中日在朝鮮的經濟競爭。然後再引用一些日方對朝鮮華僑的言論和觀點，扼要說明從 1900 年代開始到日本殖民統治結束期間日本人眼裡的朝鮮華僑的形象以及它的變化。

早在 1881 年朝鮮官員到中國討論開埠通商時，雙方就有誘致華商到朝鮮以便牽制日本經濟勢力侵入的意識。⁴ 朝鮮譯官李容肅曾向李鴻章稱朝鮮不清楚國際貿易的成規，所以期望中國商人前往朝鮮買賣，讓朝鮮有所依靠，阻止日本人壟斷市場。另外一名官員魚允中也持有同樣看法。跟據馬建中的回憶，魚允中曾經向他建議招致華商到朝鮮「以奪倭商之利」。連朝鮮國王在 1882 年致北洋大臣的咨文中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表示擔心在和日本通商以後，本國的貿易可能為外國人所獨佔，因此要求中國人民前往朝鮮通商口岸交易。朝鮮國王雖然只是籠統的提到「外人」構成經濟威脅，並沒有明確的把矛頭指向日本人，可是從上下文來看，所謂「外人」顯然就是指鄰國的日本人。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利用華商對抗日商的說法並非朝鮮人的創見。李容肅在請求通商時就引用中國駐日參贊黃遵憲的意見，即「令華商乘船來開港各口通商，以防日人壟斷」（楊、孫 1991:101）。由此可見中朝官員早就預料朝鮮在被逼對外通商以後的必然結果是中日兩國在朝鮮的經濟競賽。

中國和朝鮮對日本既然懷有對抗心理，在朝鮮的日本官民也積極採取排擠華商的手段。中朝通商章程簽定的第二年即 1883 年就發生釜山日本領事阻撓華商在該港營業的糾紛。根據中國駐神戶理事黎庶昌的報告，有神戶華商派員前往釜山租到英國人房屋開張營業，卻遭受日本領

事勒令關門，又慫恿游民前往該店妨礙買賣。黎庶昌在向日本外務省照會之餘，又建議本國政府向朝鮮交涉，早日劃定中國租界，以免將來發生同樣糾紛。他對事件背景的分析如此：「從前釜山一口之利為日人所專，今則各國通商，其利漸薄，又中國內地通商不能一體均霑，積恨而有此舉」。⁵ 類似事件並不限於日本在朝鮮的傳統根據地釜山，在新開埠的元山港也有發生⁶。自從 1885 年有長崎華僑到元山日本租界開張買賣以來，華人習慣上都寄寓在日本租界，遵守日本法規，並且分擔各項費用。可是 1887 年日本方面以自國租界不允許非日本人居住為理由，試圖驅逐華僑。經過中國政府交涉，日本雖然暫時寬容華僑繼續居住，整個事件卻要等到 1890 年華僑遷入中國租界後才告一段落。

此後，中日經濟利益在租界以外的問題上繼續發生衝突。下面舉兩個例子。1889 年駐朝鮮的袁世凱稱日本公使抗議中國商人頻頻潛往未開放之平安和黃海兩道買賣，致使仁川港的日本貿易商生意蕭條（近史所 1972, # 1451:2646-49）。日方指朝鮮政府非但不禁止如此行為，反而向華商徵稅，顯然默認這種違規的貿易活動。日本因此根據一體均霑的原則，要求日本商人也得到同樣待遇，可以到朝鮮內地自由行商。中國的反應是加強取締違規華商，以免日本借口擴張勢力到租界以外的地方。不過，從袁世凱自己的報告來看，取締的成效似乎只是暫時性的（近史所 1972, # 1452:2649-51）。第二個例子是日本假中朝商人名義設立專利鹽運公

⁴ 以下關於中朝雙方的意見出自張存武（1985:107-108）。

⁵ 近史所（1972, # 793:1258-63）。同函附件有橫濱英文報翻譯，據其報導華商所租房屋為日人所有，與理事函中所稱房屋屬於英國人的說法有出入。此外，該報稱華商租用的店舖位在日本租界內，因此遭日本領事干涉，又明指滋擾者為日商，見同書 1259-60 頁。

司，再以外交壓力打擊中國私鹽運往朝鮮，企圖壟斷中國海鹽在朝鮮的市場。根據駐韓總領事馬延亮 1907 年的報告，曾任天津領事的日本人鄭永昌與中國人劉鐵雲和劉大章發起「韓國鹽運會社」，標榜平均朝鮮各地鹽價和堵塞中國私鹽在朝鮮大規模逃稅的情形（近史所 1972, # 4449:6482-85）。不過這公司的後台並不尋常，因為它得到日本外務大臣林董的支持，一再催促中國政府嚴禁私鹽運到朝鮮（近史所 1972, # 4552:6706; # 4554:6707-08）。中國官員一方面重申禁止山東海鹽出口，另一方面卻承認中國漁民前往朝鮮打魚有載鹽出海的必要，而且海鹽生意關係旅朝華商生計至大，不宜全禁。中國政府因此陷入兩難的處境，只好對日方含糊應付。無論如何，以上的例子顯示中日兩國人民在朝鮮的經濟活動打從朝鮮對外通商開始就充滿了政治性的緊張。

與此同時，日方的言論在殖民統治開始以前已經對朝鮮華僑有一定的注意，尤其關心華僑為何比日商成功。不過從 1920 年代起，即殖民統治開始十多年後，日人的注意漸漸從華商轉到華僑勞動人口增加的問題上。以下舉例說明日方觀點的源流和變化。

信夫淳平在 1901 年出版的《韓半島》中條陳華商勝過日商的原因（15-31 頁）。他首先引用駐釜山日本領事館 1899 年的報告中對當地日商的批評，⁷ 指出釜山日本商人的各樣劣習，例如不知道世界商業的趨勢以致處於被動，貪圖眼前小利而犧牲長遠利益，不懂得靈活周轉資金以致商品售價高昂，影響銷路。不過，領事報告主要的關心是比較日本和西

⁶ 見下文第十二章元山府。

⁷ 此文原來刊登在《通商彙報》第 167 號。它的著眼處不是華商，而是日本商人和洋商的優劣比較。它借用一個奧國青年商人從長崎來到釜山積極鑽營的成功例子來警惕日本商人。

洋商人的長短，信夫卻主張日本人的主要商業競爭對手是中國商人而不是洋商。他指出，釜山的中國人勢力雖然尚未超過日本人，仁川的情況卻剛好相反。後者的進口貿易有一半以上由中國人控制，在個別進口品方面，中國人更加擁有壓倒性的優勢。

信夫認為中國的高官貴人都樂於投資，一方面提供充裕的商業資本，另一方面促使合股性商業組織的發達。與此同時，中國人的金融組織發達，有所謂票莊、銀莊、錢舖和銀爐提供匯款和貸款服務。中國商人既有資本，周轉又靈活，信用自然會好。信用好就更加能夠靈活運用資金，得到賒帳的優待，只需要每年結帳兩次。相對之下，日本商店都是個人經營，銀行服務有限，又沒有賒帳的安排，競爭時自然吃虧。商業道德方面，信夫以為中國人無論是商人還是工匠都重視信用，遵守契約，因此連京城裡的洋人和日本人都樂於跟他們交易。價錢方面，中國商人因為是從香港和上海等免稅或是低稅港口進貨，比日本人經過日本進口洋雜貨所付的稅要少，本錢因此較低，售價也就能夠維持在較便宜的水平。此外，中國人樂於薄利多銷，日本人則喜歡低價入貨、高價出售，追求眼前的暴利。再者是中國人多數打算在朝鮮長期居留，日本人卻奢望在三、五年內發財，趕快賺夠錢回家。因此，日本人在從事投機買賣以外往往沒有固定的目標和計畫，中國人則比較少有這種現象。與此同時，中國人在朝鮮行商的人數比日本人多，而且不少人在地方上擁有房產，雖然名為行商，其實是在地方上定居，經營店舖。中國行商之間又有全國性的網絡，中央與地方密切連繫，促進貨物的流通。中國人行商在生活方式上也勝過日本人。他們生活儉樸，能夠適應鄉下地方的簡陋設備和單調的生活，也樂於儲蓄，極力避免無益的消費；日本人則不一樣，不惜花費享樂。信夫因此估計在朝鮮一個中國人的生產力抵得上五個日本人。不過，這並不表示中國人不重視交際。信夫指出中國人

比日本人懂得跟稅關的洋人官員來往，建立良好的關係，在貨物通關時就可以獲得優待。反之，日本人少跟洋人來往，在辦理通關手續時往往遭遇各種困難。最後，信夫認為中國人的顧客主要是朝鮮人和洋人，日本商人卻主要跟住在朝鮮的日本人交易，因此日本人在韓國做買賣，形式上雖然算是對外貿易（從日本進口，在朝鮮銷售），實質上不過是國內貿易的延長，因為買賣雙方都是日本人。⁸

以斡旋「西原貸款」聞名的西原龜三從 1904 年到 1916 年的十三年間曾經在朝鮮活動，推動日本在朝鮮的利益。他的回憶錄中有一節是記述他在 1907 年和朝鮮人聯手跟中國商人鬥爭的經驗（西原 1949：45—53）。在他的眼裡中國商人勢力是一種惡性的經濟壟斷和剝削，有盡量壓抑的必要。他首先認定中國布商不單止壟斷中國和西洋棉布在朝鮮的批發和零售市場，也一手包辦日本棉布的進口批發，這樣的情形對朝鮮人固然是一種剝削，更加妨礙日本商人以及日本產品在朝鮮市場的發展。⁹ 他的對策是聯合四名朝鮮人組織棉布公司「共益社」，直接從日本製造商入貨，然後批發給朝鮮人零售商。該公司也試圖連絡其他朝鮮商人組織同業商會。總之，西原的目的是要打擊中國商人在朝鮮市場的地位。首先，有鑑於當時的日本棉布全部由三井物產經手出口到朝鮮再委託當地中國商人批發，西原安排鐘紡將它在九州的工廠作為專門生產出口朝鮮

⁸ 信夫的觀點可以說是代表當時日本人的一般看法。比如說，1906 年神戶高等商業學校（神戶大學的前身）的畢業生崛內泰吉和竹中政一出版的韓國旅行報告書對當地的中國商人的評價就跟信夫的論調基本相同（62-69 頁）。

⁹ 隨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積極擴大本國產品出口亞洲大陸，特別是棉布的出口。1906 年有專門向滿洲出口的「日本棉布輸出組合」與專門向韓國出口的「三榮棉布輸出組合」兩個組織的成立。因此，西原對於布疋貿易的關注與日本當時的國情基本上是一致的。

棉布之用，再委託伊藤忠商店出口，不經過中國商人直接運到朝鮮銷售。他又跟日本和朝鮮的鐵路當局交涉，取得特惠優待，除了減輕運費以外，還縮短了運送時間。他驕傲的宣稱自己的努力結果是日本棉布的銷路迅速擴大，而且連帶朝鮮人布商生意興盛。四年後他進一步設法要把中國布商從朝鮮徹底排除。方法是一方面著手改良朝鮮土產的麻布以取代中國進口；另一方面又派人前往上海跟當地的布商交易，直接進口。此外，他又從日本郵船公司和鐵路局取得優惠價格，更加以不賺錢的售價和中國商人競爭。結果，如此激烈的競爭方式迫使中國商人所依賴的上海至仁川的德國貨輪停航，導致中國布商勢力一蹶不振。中國商人雖然促使上海方面停止與共益社直接交易，卻因為停航的關係，始終難以恢復已往的局面。

在信夫（1901）等早期日本人論述裡出現的中國人主要是進出口貿易商，有時候也會提到雜貨零售商和行商。出現在 1920 和 30 年代材料裡的中國人在職業上比較分化，在商人以外還有熟練和非熟練勞工甚至農民。這除了反映華僑內部的社會經濟轉變外，也反映了日本人對於華僑問題認識的進展。無論是朝鮮總督府的調查（1924）、小田內通敏（1926）和服部暢（1931）的個人著述、還是警察當局的報告（朝鮮總督府警務局 1927，著者不詳 1938）都顯示日本人非常關心對中國勞動者流入的問題，甚至表現有明顯的排斥傾向。

1926 年出版的小田內通敏著《朝鮮支那人的經濟勢力》繼承了總督府報告書對華僑勞動者和農民的關注，把朝鮮華僑分成三類來討論，即商人、菜農和勞工。小田內的這本小冊子的一貫主題是華僑的強大競爭力。根據他的分析，華僑無論是從商、務農還是當勞工，都能團結一致、吃苦耐勞、節儉儲蓄、長久打算。他認為華僑勞工因為體能比朝鮮人好

所以效率高，比日本人則因為工錢低所以非常划算。基於類似的原因，華僑商人和菜農比朝鮮人和日本人的同行都來的成功，對後者構成很都大的威脅。他宣稱總督府限制華僑職業和住所的措施雖然有一定作用，卻沒有完全阻止華僑人口的增長。而且，他估計將來朝鮮因為都市化和工業化必定更加需要華僑勞工，使移民問題變得更加深刻。不過，我們必須指出小田內並沒有明白的主張排除華僑，也沒有公開的批評華僑的道德和品格；相反的，他對日本官員處理華工的態度有意見，警告他們如果不自我警惕的話，很可能會刺激華工的反日情緒。他建議日本人即使要取締華工，也應該先把他們當做人來看待，試圖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文化。

如此，日方對於華僑的注意有從貿易商移向小商人和華工的傾向。朝鮮警務當局 1927 年的報告書的分析重點就是一個例子。它指出中國工人在工作上勤奮老實，生活樸素，拼命儲蓄，不像日本人和朝鮮人那樣會把錢財浪費在酒色上。這些勞工大部分是非契約性的，輾轉朝鮮各地就業。屬於定居型的是農民，他們住在市郊，供應城市所需的蔬菜。近年出現的新現象是中國人製鍋業，他們以機器製造，廉價推銷，生意超過日本人和朝鮮人。此外，中國人從事的行業還有理髮、飲食、製饅頭等。如此，中國人鑄鍋工匠和布疋的行商的足跡遍及朝鮮半島各地。中國人勞動者的大量湧入更加使得當局在管理上有困難。中國人從事勞動有法律的限制，除了居所比較穩定的農民以外，其他的勞工不少沒有正式辦理手續，這樣的情況是在靠近邊界的建築工程地點和木材廠尤其嚴重。朝鮮當局雖然有所謂保護本地工人的政策，卻往往難免妥協，允許僱用中國工人擔當朝鮮人所厭惡的工作，如水中作業和使用炸藥，也有日本僱主聲稱中國人擁有特殊技能，或者借口農忙還是工程期限緊迫，要求招募中國工人。有些甚至有誇大所需工人的總數以增加自己所能僱

用中國工人的人數。經過朝鮮土木協會的多方陳情，在 1927 年的階段（報告書沒有清楚寫出這個規定的生效日期），僱主可以僱用中國人達到總勞工人數的三分之一。最後，中國工人對勞工運動並不積極，他們所參與的糾紛主要是因為僱主不發薪水或者是對於薪金的計算方法有誤解。有時候他們也會參加朝鮮人的勞工運動，不過當局認為他們不會帶頭製造紛爭，也不會在幕後煽動。

服部暢在 1931 年出版的《朝鮮及朝鮮人的經濟生活》中特設「支那人患」（21-27 頁）一章，強調中國人在朝鮮對日本人和朝鮮人所構成的威脅。他首先指出中國人口流入東北（滿洲）再從滿洲進入朝鮮半島是歷史性的發展，是不容日本人忽視的事實。他跟小田內一樣，以新義州為例，說明華僑人數雖然比日本人和朝鮮人少，在當地的經濟活動卻非常引人著目。雜貨店都是華僑經營的，賣魚和賣菜的也是華僑，建築工人、馬車夫、人力車夫全是華人，當然種菜和燒飯的也是他們。服部進一步指出滿鐵的巨大建設成就，如海港、鐵路、道路等都是依賴中國人的勞動力。同樣的，雖然受到條規的限制，朝鮮的建築業還是使用華工。服部指出日本人在朝鮮主要從事服務業，所以受到的影響還不算大，不過大部分的朝鮮人顯然不是華僑的競爭對手，難免受到正面的沖擊。他斷言這是因為朝鮮人不適應非農業性的城市生活。可是，他也指出朝鮮人非常蔑視華僑，可能因為華僑是「賤農賤商」，也可能是對以前崇拜中國的一種反動。無論如何，服部的警告是華僑的廉價勞力是一個世界性的威脅，而朝鮮因為地理的關係會受到直接的影響。

九一八事變（滿洲事變）和蘆溝橋事變後中日關係急遽惡化，日方對朝鮮華僑的敵意因此變得表面化，甚至出現在官方紀錄裡。朝鮮保安當局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出版的《最近朝鮮的治安狀況》（著者不詳 1938）

就是一個好例子。本書在「外事警察概況」(237-238 頁)的項目下給朝鮮華僑一個極端醜惡的描述。它宣稱華僑的特性是能夠吃苦和「拜金主義」,所以他們能夠深入朝鮮社會,蠶食朝鮮人的商品和勞動市場。這種行為結果引起朝鮮人的反感,最後演變成排華的衝突事件。此外,本書又發出警告,指華僑中間有不少分子是性情兇殘、有膽作奸犯科的。我們可以看到本書中華僑的形象完全是負面的,他們不但貪財更加不惜以犯罪手段來達到目的。他們在朝鮮受到的迫害似乎也是他們自作孽的結果。

日本殖民政府對於朝鮮華僑的忌諱和敵視到了戰爭末期更是變本加厲。總督府 1944 年 8 月準備的〈第八十五回帝國議會說明資料〉(近藤 1961:76-78)指出自 1938 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員在朝鮮進行偵察和破壞,1942 年檢舉七十人,1943 年四十九人,1944 年七人。他們有些是假裝勞工應徵到朝鮮工作,另外一些是祕密入境後混在勞工、店員或是行商之間活動。本材料指出朝鮮華僑的思想有極端化的傾向,加上大部分華僑的出身地的山東省是八路軍的巢穴,因此可以推測共產黨在朝鮮擁有龐大的地下組織。此外,華僑又被指控在進行經濟破壞,通過操縱價錢和從朝鮮走私把重要物資。總之,我們發現由於戰爭的關係,華僑的形象已經從精明的商人或者是勤奮的勞工變成思想極端和進行破壞的敵人。

總而言之,殖民地時代日本人主要把朝鮮華僑看作競爭的對手,無論是在商業、農業還是勞動市場上,華僑都被認為不但是遠勝於朝鮮人而且直迫日本人。隨著中日兩國武裝衝突的大規模化,日本人更加開始把華僑看成破壞分子,受共產主義的影響在朝鮮進行經濟和軍事破壞。